



漫画角



心声

王祖和 绘



赞歌

王永琦 绘



红红火火庆国庆

田志仁 绘

孙嘉淦“装阔”



温故

卜庆萍

孙嘉淦是清朝前期较有影响的政治家，官至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正直清廉，敢言直谏，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是历史上与唐朝魏徵齐名的谏诤之臣。

当年事已高、告老还乡时，孙嘉淦想“装一次阔”：自己一辈子不贪不占，没有攒下几个钱，如今荣归故里，还是一副穷酸模样。若空囊还乡，遭乡绅土财耻笑不说，也给朝廷丢脸。他吩咐仆人，连夜买来十几个大木箱，每个木箱都装满重重的砖头。第二天，輶重浩荡，启程返乡。

岂料，皇帝接到举报，说孙嘉淦平常假装清廉，其实是个大贪官，金银财宝带了好几骡车。孙嘉淦行至半路，突然遭到拦截检查，自己“装阔”的事一下子露了馅儿。此事禀报皇上，皇上很是感动，于是钦命沿途官府，以真金实银换下孙嘉淦箱子里的砖头，算作重赏。

“装阔”这件事，也能看出，孙嘉淦的为人处世和为官之道。乾隆帝即位之初，孙嘉淦上疏《三习一弊疏》，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乾隆帝采纳后，向满朝文武推荐，在一定程度上，这份奏疏促

进了江山稳固，促成了康乾盛世，其意义可谓深远。《三习一弊疏》还被晚晴政治家曾国藩所借鉴。曾国藩对其内容极为赞许，并全文抄录，作为座右铭，选定在古代17篇重要奏议之中。

《三习一弊疏》奏议，对“三习”作了详尽论述。其曰：“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这“三习”是说，耳朵听惯了赞美之言，就会喜欢阿谀奉承，而厌恶真言忠劝；眼睛看惯了服从屈膝，就会喜欢俯首帖耳，而厌恶刚正不阿；思想习惯于自以为是，就会喜欢听命顺从，而厌恶顶撞违背。《三习一弊疏》中的“一弊”，即这三种恶习形成之后，必然产生“喜小人而厌君子”之弊端。孙嘉淦奏疏鞭辟入里，句句如金。

孙嘉淦还严格定下《居官八约》，在为官之路上时时遵从和践诺。《居官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居官八约》是说，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对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不争权夺势迫逐功名，办事务求兴利除弊，说话务求简明扼要，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时时厉行节约清正廉明。《居官八约》言简意赅，涵盖广阔，是孙嘉淦为官做人的行为准则，颇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世象管见

吴启钱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请求法院以强制程序保护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的法定有效期限。我国《民法典》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在法律咨询服务中，我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现象，《民法典》实施之后，多数咨询者首先问的是“时效过了没有”，或者更直白地问“时间还够不够”，而不是之前首先问的“官司能不能赢”。这说明，经过两年多《民法典》知识的普及，公众在思维层面，已经从首先看重官司输赢的“实体实效”，转向关注关系官司输赢的诉讼时效了。

法律之所以要规定一个诉讼时效期，是基于“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这样的原则。比如，对于债权人而言，诉讼时效过了，有理也可能赢不了官司；对于债务人而言，如果对方的诉讼时效已过，自己无理也可能不会输掉官司。

因此，要实效就必须重时效。这个道理，其他领域同样适用。

镇海陈氏：

百年涤荡中的家族传承密码



顾科明

一个家族的命运，需要由多代积累的资源、文化和家风所构成。经历过风光，也经历过坎坷，却不向命运屈服，这样的家族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镇海贵骊有陈氏家族，明正统间（1436年—1439年）自鄞县姜山迁居慈溪青林渡，转迁镇海沙河头村。至清末，家族里有个陈建杭，幼孤而贫，与母亲接续经营一家小店，十余年后家资渐裕。陈建杭不幸中年去世，妻子周氏以一身主持家政近40年，年逾古稀依然天亮起、半夜睡；同时严格督促五个儿子课读，终于培养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陈曰稔。

陈曰稔登科时37岁，年富力强的他，顺利在山西当上知县，历任灵丘、河曲、和顺、阳城，后转任介休。但一帆风顺从来就不是完整的人生，55岁那年，他被命运狠狠地撞了一下腰。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光绪出逃，10月4日行至介休县义安村时，一名叫郭敦源的义和团头领冲撞仗仗，被就地正法。介休知县陈曰稔“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实按照上司——山西布政使赵尔巽的看法，陈曰稔的去职是个悲剧，要共济时艰，缺的就是这些有能力、敢担当、肯干事的下属。后来陈曰稔和夫人六十寿时，赵尔巽还特地发来贺词，

社会治理中，危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风险隐患的排除，都讲究一个“快”和“早”，防患于未然。如果不把握“第一时间”“第一情绪”“第一信号”，到生米煮成了熟饭，一切都晚了。

在媒体领域，时效性永远被新闻学教科书或者一线采编人员放在前位。新闻事件发生后，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是媒体及其工作人员一直追求的目标。

个人成长也一样。“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古人的教导；“出名要趁早”是张爱玲的悲鸣；“从娃娃抓起”是当今社会的共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我们“栖居于时间之中”。一切事物都在时间中产生和消逝，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到最后会归结于时间这个度量单位，时过境必迁，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管理学家麦金西说：“时间是世界

上一切成就的土壤。时间给空想者痛苦，给创造者幸福。”毛主席更直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但是，时效不等于实效。踩准了时间的鼓点，并不一定能跳出优美的舞蹈来。

还是以新闻报道说事。虽然无时效性的新闻传播效果差，但新闻的生命却不在时效而在真实，不真实的新闻根本就算不上新闻。而且，在真实之外，好的新闻还讲究语言、结构等表达艺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探寻事实的真相需要时间，所以不能仅仅为时效而时效。各类媒体上那些获奖作品，无不是兼具真实性与时效性的好新闻，而那些假新闻则极大地败坏了媒体的声誉。

民事官司也一样。诉讼时效只是官司输赢的一个前置条件。要打赢一场官司，关键在于举出优势证据来证明事实、引用相关法

律规定来对事实进行判定，并有一位能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独立作出公正裁决的法官。

在教育孩子的教育上，“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情形常常发生，也是因为父母或学校错误地以知识、而不是以常识当作人生的起跑线，只重时效而失实效。

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方向反了，时间与速度就是致命的变量。前几天，看到一份某政府机关8月份才印发的“2022年工作计划”。我的“判词”是既无时效也无实效，纯粹是为发文而发文，是一种典型的“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的形式主义。

因此，无论做人做事，时效与实效缺一不可。重实效必重时效，重过程更重结果。

时效需要有敏感性，时刻有“时不再来”的紧迫感；实效需要专业，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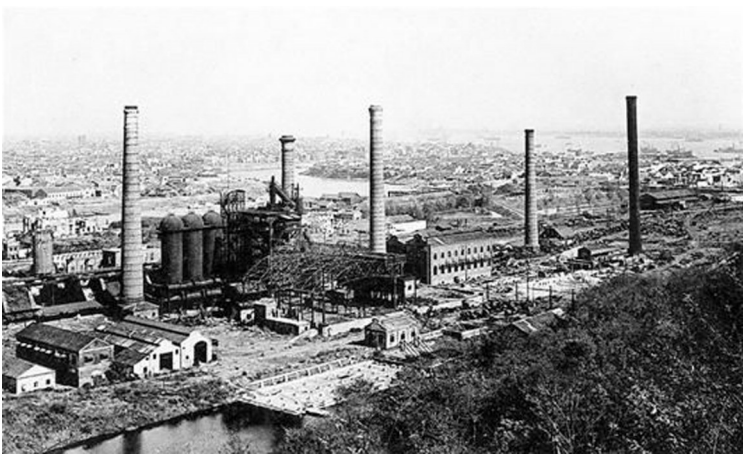


由此回溯至光绪七年（1881年），陈曰稔为离世25年的父亲撰写墓志，倾情回忆其筚路蓝缕的一生，既百感交集，又不无自豪：“生平俭于自奉而好施乐善”“拯人患难，汤水必赴；规其过失，针砭尤切”“惟本实心行实事，故当时无赫赫名，而懿德纯行身后弥令人思”；特别是父亲“好读书，有义足劝惩者，则召儿辈于前，口讲指画，谆谆不倦”，让陈曰稔感受到“今儿辈粗解文义而克自树立者，盖得之庭训为多焉”。

1925年，陈居综等编撰《蛟川灵绪乡沙河陈氏西宅宗谱》，卷首特地收入《陈氏新增宗约》。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要求宗长为一族瞻仰，房长为一房表率，必须品行端方，心地光明，精神充足。以此衡量，陈建杭、陈曰稔、陈居综三代领头人均当之无愧。

《陈氏新增宗约》的一系列规定，让族人长幼有序、行动有规、申告有门，但不提倡无理由抱团和护短：“子姓中如有人素柔懦、家仅孤寡被外人欺陷者，各贤达务须力为昭雪。其自取祸害者，不得偏护以长恶习”；游手好闲，不安本分，征逐赌博，勾引匪恶的，除将之出族，还要请究不贷。

这些都是来自生活的真知灼见，约束子女树立良好品行和规范人生。这其实也是陈氏家族虽经百年时代洪流涤荡，却依然枝繁叶茂的传承密码。



汉冶萍公司（资料图）

赞扬他在山西的十八年体用俱举，既亲民，办事又有主见，堪称循吏。

仕宦之路戛然而止，陈曰稔内心自然备受煎熬，晚年他回顾此事，称“此中或有因果，殊不可解”。好在他并没有顺势“躺平”，而是殚精竭虑培养下一代。

他将长子陈居综推荐给赵尔巽做幕僚，让次子陈居绂纳粟当县丞，将三子陈居纪、四子陈居绉、五子陈居维相继送入大学读书。儿子们个个争气，成长为国家需要的人才：次子历任南昌、奉天大清分银行经理；三子从山西大学毕业，后游学英国，得工学博士，民国时任扬子机器制造厂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任马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从事钢铁行业30年；四子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土木系毕业；五子北洋大学矿科毕业，终身服务于煤炭工业。



五个儿子中，长子陈居综出道最早，经历也最丰富。他25岁中考顺天府举人，干练有才。赵

尔巽见辄大喜，倚为膀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湖南巡抚时，特地携其同行，让他署武陵县知县，后来又代理四川宁远府知府。在任有功，奏保二品衔、候补道员。民国初年到云南边陲任军职，修举新政，倡导科学教育不遗余力。简任两浙盐运使，充本省海宁塘工局局长。后脱离官场，主张实业救国，振兴民族工业，曾先后投资创办丝厂、银行和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也是最早的钢铁煤联合企业）。出资培养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俱各有成就。

1912年2月，上海有报纸刊登消息，称清朝遗老溥伟、铁良等跑到奉天，拟借外国军队，与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东三省谋独立。时任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熊希龄闻此消息后大惊，与陈居综等5人联名发电质询赵尔巽。当日，熊希龄又与陈居综联名给奉天都统张作霖发电。两电发出后，迅即得到赵和张的回应，所谓“借外兵”“谋独立”纯属子虚乌有。事虽“乌龙”，但也看得出陈居综的爱国热情。

陈居综字璇珠，号理卿，官名廷绪。后定居杭州，兄弟子女



新知

王东京

货币既能推动经济发展，但也有负面作用，甚至可能闯祸。

若站在企业的角度，这样讲似乎不太好理解。对单个企业来说，货币作为商品的固定等价物，手里的货币越多，调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货币当然越多越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货币是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

但若从宏观角度看，货币并非多多益善。何以见得？对此需要我们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区别。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是不断增值的价值，其“实物形态”是各种生产要素（商品）；“价值形态”则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就是说，货币本身并非资本，特别是当金银货币退出流通后，货币只是资本的纸制副本。

是的，货币与资本不是一回事。若读者不信，可以去读《资本

论》，你会发现马克思说“货币是第一推动力”，那里的“货币”其实是指“货币资本”，而不是指纸币（钱）。当一国发行的货币等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时，货币是资本。若货币超发，不仅不会增加资本，反而会导致货币贬值、引发通胀。

让我举个例子解释。根据货币流通公式：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一定时期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流通速度。假定商品价格总额为50万亿元，货币流通速度5次/年，则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为10万亿元。假定央行发行了12万亿元的货币，那么这多发的2万亿元没有对应的商品，就只是钱，而不是资本。

因此，货币要发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少应具备以下三大前提。

前提一：货币供求要保持总量平衡。在金银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货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当纸币替代金银货币流通后，若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必然导致通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弊大于利，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后果。

前提二：商品供求要同时保持总量与结构平衡。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史皆表明，货币是中性的，货币调节属于总量调节，解决不了结构问题。当供给短缺时，增加货币投放只会拉动价格上涨；而当供给过剩时，多发货币也只会火上浇油，加剧生产过剩与结构失衡。

前提三：货币资源的分配应由市场起决定作用。有两个重点：一是要尊重市场“等价交换”规则，政府不能管价格；二是要放开市场利率。对某些需要扶持的企业，政府可用财政贴息的办法予以支持，

不可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率。只有让市场化利率引导资金流动，才能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可靠前发力，重点减税，但货币政策则应继续保持稳健，绝不能搞大水漫灌。

第二，为了保就业与民生，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扩大内需与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坚持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

第三，应重视GDP增速，但不必纠结5.5%的速度指标，要保持定力，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